

# 容闳和中国第一批幼童赴美 留学活动始末述实

胡德海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1872年8月,清政府决定派遣幼童至美国接受西方教育,开我国公费留学之先河。容闳主持其事,历时九年。

**关键词:** 容闳;清政府;幼童赴美;留学;西学东渐

**中图分类号:** K250.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8-3901(2001)03-0073-10

清政府官方派遣留学生,始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这一年标志着我国留学教育事业的开始。1872年8月,当时的清政府采纳了容闳为振兴中国,必须发展科学,欲发展科学,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建议,决定派遣四批幼童生,共120人,分四年(1872—1875),每年30人,送往美国,自小学或初中开始接受西方教育,为了照顾方便且能继续研读中文起见,清政府特派容闳主持其事。并在美国康涅狄克州首府哈德福城(Hartford, Connecticut)设立留学生事务所。开我国公费留学之先河。容闳为此计划,费尽心血,几遭挫折,前后达十余年才得以实现。可惜此项计划,因当时政府官员见解不同,引起纷争,致遭中途撤销,全体留学生于1881年弃学返国。前后在美共九年,返国的留学生,只有第一批去的中有二人完成大学学业,然他们返国后对国家建设及科学发展贡献很大,尤其从此形成的留美风气,日甚一日,对我国百多年来的政治、经济、科学的建设与发展关系甚大。

1986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康涅狄克州州立中央大学讲学,得知坐落在康州新港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便是我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的母校,而当地正是当年容闳所率领的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生在美学习、生活的中心地带,因此更加注意阅读搜集有关中英文资料,并于年12月17日下午2时,由康州中大华裔教授傅维宁博士陪同,专程驱车至哈德福城之西带山公墓,凭吊了长眠在那里绿荫深处已74个春秋的容闳博士碑墓,现在事情过去已多年了,但光景仿佛如昨,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总觉得有一种责任需要把我所看到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整理出来写成文章,公诸同好,这不仅对这位为中国近代化而努力了一生的先辈及其事业是一种应有的纪念,同时对我国留学教育也可借此提供或补充一点史料。我在此须郑重声明的是,我的这篇文字材料,许多地方参考了美籍华裔教授傅维宁博士所提供的材料和他写的有关文字。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又作莼甫、纯父、纯圃、淳甫、春浦、纯斋等),英文自署 Yung Wing。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距澳门只有四英里)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之所以能入学读书,并能于早年出国留学,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澳门是西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1835年,德国籍传教士郭士立的夫人(Mrs. Gutzlaff)在澳门设立女塾。1836年,马礼逊教育会筹备开办一所学校,纪念已故的马礼逊博士(Dr. Robert Morrison),拟招收若干中国男童,先在郭士立夫人塾中寄读,父母便托人把七岁的容闳送到这里读书。1841年,容闳正式进入马礼逊学堂,翌年又随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美国老师勃朗先生(Rev. S. R. Brown)。容闳的不致因家贫辍学,以及后来能去美深造,主要是由于勃朗先生及其朋友的帮助。

1847年1月4日,十九岁的容闳与黄胜、黄宽等三人随勃朗牧师离开广州从黄埔港上了载运茶叶的“亨特利思号”(Huntress)帆船,开始了到美国的旅程。

容闳一行抵美时为1847年4月12日,计居舟中凡九十八日,旋到勃朗家小住,一星期后乃赴马萨诸塞州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孟松学校为新英格兰最有名之预备学校,校长海门德(Hammond)对容闳等三个中国留学生特加礼遇,“盖亦对于中国素抱热诚,甚望予等学成归国,能有所设施耳”。

在孟松学校之第一年,容闳等三人均列英文班中,所习者为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容闳并在海门德校长亲自教授下,诵习英国文学。1848年秋,黄胜以病归国,黄宽决定两年学习期满后赴苏格兰人爱丁堡大学学医,容闳则立志报考勃朗先生和海门德校长的母校——耶鲁,并为此而努力学习拉丁文及希腊文。

勃朗先生和海门德校长也极愿容闳入耶鲁大学深造,想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但学校原有规定,欲取得此项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先具志愿书,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容闳虽然感激乃师的好意,却坚决拒绝了为他安排的这种前途。因为他爱自己的祖国,他致力追求西学也正是为了有益于中国。1850年毕业后,他终于取得乔治亚洲萨伐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的资助,考进了耶鲁大学。入学后,他生活极为俭朴,一切洒扫拂拭劈柴生火等劳动都自己干,“雪深三尺,亦必徒步”;还必须不断“为人工作”,如替同学办伙食,替“兄弟会”管理图书之类,以取得必需的零用钱。

容闳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苦学,“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因为预修不充分,他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太好。但是文学和哲学的成绩弥补了这个缺陷。第二、第三两学期,他的英文论说连续获得头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大家都充分承认这位优秀的中国青年的卓越的学习能力。

在1847至1854的七年间,容闳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知识。他并没有过多接触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对于一个思想敏锐而又时刻关心着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的青年来说,化学实验在玻璃仪器内显示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微积分可以启发对合理化的思考和追求,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史也足以使他痛切地感觉到专制制度的违反人性和缺乏道德基础。他逐渐懂得;到外国留学,不能只学各科常识和外国的语言,那样做,“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灵性之鸚鵡耳,曷足贵哉”!

1854年11月13日,二十五岁的容闳揣着羊皮纸的耶鲁大学毕业文凭,从纽约登上“欧里加号”(Eureka)帆船,踏上了归程。容闳在大学二年级时即入美国籍,但他无意在美国工作,他以满腔热血,抱着救国救民的大志,愿以自己所学贡献国家,然而回国后,很难进入政府工作,曾一度做茶叶生意;希望通过太平军“为中国谋福利”的尝试亦告失败,转而于1863年找到了曾国藩,希望通过曾来实现“西学”得而“东渐”的计划。

在《西学东渐记》中,容氏对曾国藩的评价极高,说曾“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如何评价曾国藩,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就事论事,他接受容闳的建议,设立制造局,派学生出洋,这两件事情总算是做得对的。

问题恰恰在,即使得到了像曾国藩这样的大人物的支持,容闳的“为中国造福”的大计划——派遣学生的教育计划,在勉力推行一段之后,也终于还是完全破产。《西学东渐记》十六、十七、十九等章,对这件事的全过程有详细的介绍。一百二十名学生,从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起,分四期逐年赴美,原定十五年学成回国。可是由于受到坚持闭关自守、反对学习外国的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继曾国藩而主持“洋务”的李鸿章首鼠两端,1881年这些学生又全部被撤回了。留学生事务所撤销后,他随学生回国交差,1883年因夫人病重返美,三年后夫人病逝哈城。容闳于1895年应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召返国,协助张氏拟定国家银行计划。晚年并参加革命,与孙中山、梁启超、荷马李均有来往,戊戌政变失败后,容氏组织中国强学会,并任第一任会长,因为鼓动革命,被清廷通缉,悬赏十万元捉拿。辛亥革命成功后第二年(1912),因患中风于4月21日病逝于康州哈德福,享年八十三岁。在去世的前两天还收到孙中山先生寄给他的信及照片,可惜当时容闳已不省人事。遗体葬于香柏墓园(Cedar Hill Cemetery)。1876年耶鲁大学因为他的成就及对国家的贡献,特授予荣誉博士。1954年6月13日(死后四十二年)正值容闳毕业于耶鲁一百周年,在耶鲁举行仪式,追认容闳为十九世纪耶鲁杰出毕业生之一。由胡适、晏阳初主持此一仪式。

现在再说容闳自美返国后致力于西学东渐留学教育事业的经过情形。

当容闳自耶鲁毕业返国后,清廷政治腐败无能,视西方为蛮夷民族,他知道自己的出身及所受的西

方教育不会被清廷重视,他的意见不会被清廷采纳,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清廷比较开明的高级官员,当时正是曾国藩统率三军,以轮船运送军队,使用西方新式武器平定太平天国军的时候,曾国藩非常欣赏西方军事武器的威力,一心一意要使中国军队现代化,同时积极的建立海军。曾国藩自己对西方的情形不太了解,急需一位对西方情形有深刻了解的助手,可以帮助他计划及购买西方机器及武器,建立船坞及兵工厂等。在当时这种人才当然少之以少,难以物色到,而那时候的容闳,正要找一位政治上有权位说话有力量的高级官员,以实现他的抱负,以当时曾国藩在政府的地位,如能得到他的帮助,不管什么计划由他提出来,清廷必会给予认真的考虑。就这样,两位不由地走到了一起。

1863年,容闳第一次晋谒曾国藩,谈话结果,曾要求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建立兵工厂。当时容闳就有意将其派遣幼童生赴美接受西方教育的腹案告诉曾国藩。但经朋友建议而作罢。他心里明白,只要曾国藩能信任他重用他,不愁他的计划不被清廷采纳。

1864年,容闳赴美在麻省办理购买机器,次年江南制造局在上海高昌庙成立(亦称上海制造局),该厂不但制造枪械弹药,同时采纳容闳意见,设立技术人员训练所,且有译书部门,翻译科学书籍。因为容闳在设厂上有功劳,曾国藩向清廷奏请授容闳为五品实官,并获批准。在他和曾国藩这一段相处时,容闳曾将他的派遣幼童生出国接受西方教育的计划向曾提出。但曾劝他这种计划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必须慢慢地先使清廷保守派官员能够接受后再提出,以免全功尽弃。

容闳深信欲使中国强盛,在兵工厂外,必须设立训练中心,尽速训练人才,然而这种学校需要大量外国专家及技师。这批专家需要付出高额薪水聘雇,而且这些专家不见得会忠于我国认真服务。所以为长久计,必须培养自己的人才。所以他一心一意想要政府保送优秀青年接受西方教育和技术训练,以造就强国急需的各种人才。

由于江南制造局采纳容闳的建议,附设兵工学校,训练出许多技师及工程师等,对中国现代化奠定良好基础。因此曾对容闳非常赏识。这时候容闳改任上海当局的翻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和江苏巡抚丁日昌很熟。丁为人精明能干,是前进派人物,勇于做事。容对其派遣留学生出国接受西方教育的计划也曾向丁说过,并获得丁的赞助和支持,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未能向清廷上奏。

1870年春,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难以应付,特派四位大臣驰往天津调停,处理善后,这四位大臣中就有曾国藩和丁日昌。对外人交涉,当然容闳是得力助手,丁日昌邀容闳以译员名义同往。当教案结束后,趁四位大臣尚均在天津时,容闳向丁巡抚旧事重提,并请其商请曾国藩及其他两位大臣就近协助。结果四人联名将容闳的计划奏报清廷,丁亲自到容闳住处将这个信息告知容闳。容闳真是喜出望外。当时兴奋的心情可由其自传的一段记载作为写照:

“有一天很晚,丁巡抚回到总部,我已入睡,他到我住处唤醒我,告诉我四点计划已获曾公同意,由他们四人连衔入奏清廷采纳实行。这个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一夜未能合眼,我躺在床上和夜毛鹰那么清醒,我如同腾云驾雾,有飘飘然之感,自己竟忘记身在床间”。

从这一段记载,可见容闳对他的西学东渐事业是何等的热切和醉心。

当时奏报清廷的计划内容共有四点,保送留学生出国只是其中之一,根据容闳的自传记载,这四点计划要点是:

(一)筹组合资轮船公司,由中国政府及人民投资,工作人员全为中国人,为营业发达计,政府要每年津贴,此项津贴由镇江、上海等地运往北京之漕米税款项下开支。当时运米船不下数千艘,多由运河两岸居民经营,运法不善,船行缓慢,抵达北京,需时太久。沿途侵蚀,尤值天气炎热,米生蛀虫,损耗甚大,品质低劣。如能设立轮船公司,可以解决运米问题,既可减少米的损失,又能保持原有品质。

(二)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为国家贮备人才。派遣方式,先选派一百二十人,分四批赴美,每年一批,计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约十二至十四岁。并选派中文教师同往,以期这批学生在美可以继续进修中文。学生在外国的食宿入学等事宜,只设留学生监督两位负责管理。此项计划所需费用由上海海关税收项下提拨。

(三)政府宜设立机构,开采矿产,兼谋运输之便利。凡是由内地可以通达商口的,应修筑铁路,以利交通。

(四)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以防止外人干涉。当时天主教的势力已超越宗教范围,教徒遇有民刑诉讼事件,教会竟然越俎代庖,自行裁定。失去我国主权,政府应设法禁止,任何教会,除有关宗教者外,无权管理中国教徒。

以上四项计划,在容闳心里,最重要的无疑是第二项,即选派青少年出国留学。据容闳自传记述,其

它三项,只是陪衬,并有助于第二项计划不被清廷批驳,以期顺利过关。

1870年冬,容闳渴望已久的消息终于来到了。清廷批准了曾国藩等的奏章,容闳的教育计划可以因此付诸实施。曾国藩通知容闳,并嘱他开始着手筹备事宜。

留学计划批准后,首先应该决定的是派往哪一个国家?很自然的选定了美国。其原因不外,其一,容闳是美国留学生,他最了解美国的教育制度,在那里有许多朋友可以协助他;其二,蒲安臣条约(Anson Burlingame Treaty)于1868年签订,中国人进入美国公立学校,须享有最优国人民待遇,美国人入中国公立学校亦同,美国人可在中国指定地方设立学校,中国人亦可在美国设立学校,这一条约不同于十九世纪我国与列强所签订的诸项不平等条约,具有一定的互利、平等性质。

1871年容闳奉曾国藩之命,设立上海出洋总局,开始办理招选学生事宜。其选派办法及学习事项可由该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与李鸿章合奏选派幼童赴美办理章程十二条窥其大概,今摘录重要数条于后:

△商知美国公使照会大伯尔士顿将中国派员每年选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书院肄业缘由,与之言明,其束修膏火一切均由中国自备,并请俟学识明通量材拨入军政,船政两院肄习。至赴院规条,悉照美国向章办理。

△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出洋等事,拟派大小委员三员,由通商大臣割飭在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如资性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局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即撤退,以节糜费。

△选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臚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

△赴洋学习幼童入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肄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译载细册,齐送上海道转报。

△驻洋正副委员二员,每员每月薪水银四百五十两,翻译一员,每月薪水银一百六十两。

办法内亦明文规定来回川资,衣物等费。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川资银七百五十两,幼童每名来回川资及衣物等银七百九十两,幼童驻洋束修膏火屋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年计银四百两。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条件相当好了,就凭政府供给十五年全部费用这一点,招生处应该会挤得水泄不通,何况又无留学考、托福考,何愁没有学生来源!可是在那个时候,容闳所首先面临的正是这个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生源不旺,招收学生不容易凑足三十人。何况又要挑选身体健康,智力强的学生,到后来,容闳竟不得不亲自出马,到广州及香港一带招募学生。当时在北方长江流域竟没有一个学生申请,原因不外这几个:其一,北方人怀疑清廷真的会免费资送学生出国读书;其二,“父母在不远游”的旧观念仍根深抵固地在一般人的脑海起作用,不愿自己的儿子那么年轻便远离家门到一个根本不知道的地方去,而且又去得那么久;其三,事先宣传不够,当时的新闻传播,不像现在这样迅速普遍,容易做到家喻户晓。因为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事物,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计划。

容闳之所以去广州、香港招募留学幼童,是因为这两个地方与西方文化接触得较早较久,守土的传统观念较少,而且有的中国小学生读过英文学校,比较容易说服动员。容闳更以私人及乡谊的关系,招募到许多来自香山县的学生。于是第一批三十人,总算招足,可以开班受训了。这第一批的三十人中,二十四人来自广东,其中十三人来自香山县。在全部四批一百二十人中,百分之七十来自广东,三十七人来自香山县。这里描述一个故事,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招募学生的困难情形、据当时一位返国留学生以后的追求:“当时我是一个小孩子,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尺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消。”大约是因为第一、二批的人到美国后,没有被剥皮接种,当怪物玩,所以第三、第四批比较容易招足,而且北方人也逐渐地多起来,比较有钱的人,也开始申请加入,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竟然没有一个满洲人送他们的儿子参加这个教育计划,在这一百二十人中,多是十二、三岁,最小的是十岁,最大的十六岁。

1871年春夏之间,预备学校在上海正式开学,由刘开成(瀚清)任校长,刘为曾国藩幕僚之一,协助容闳推行此项计划,后容闳赴美,安排第一批学生,刘在上海承担全部训练任务,前后四批均由他负责,是

年冬,第一批幼童正在预备学校受训时,曾国藩在南京病逝。这时幼童虽还在国内,尚未跨出国门,但容闳长期筹谋促进西学东渐的留学教育计划已播种发芽,开始滋长,曾国藩之死,对留学计划的实施,已无碍,但平心而论,事情发展至此地步,曾国藩之功,实不可没。

第一批30人于1872年8月拜见上海道台及美国领事馆后离开上海。过日本横滨,换船驶美,先抵旧金山,停留三日,再乘火车,横跨美国大陆。到达美国东海岸的康涅狄克州哈德福城,时已九月初,在路上一个多月。

当时留学事务所的人员编制是:监督(委员)工人、汉文教师、其中一位兼秘书、翻译人,另外有厨师、洗衣及佣人等。在留学生事务所初成立时,监督由容闳及陈兰彬担任,容闳负责指导学生所学习的课业,并筹划寄宿事宜,陈兰彬专管学生留美期间汉语文的教学与学习安排工作,至于事务所的经费,则由两人共同负责。汉文教师由叶绪东(源浚)等担任,翻译为曾兰生(恒忠)。为什么要用两位监督呢?据容闳的记述,当时为求留学计划能由清廷顺利批准,丁日昌要容闳和陈兰彬共同负责。以期对清廷守旧派的阻力有所减抑,使计划得以顺利进展。容闳和陈兰彬原不相识,是在天津教案办妥后由丁日昌介绍认识的。陈在清廷官拜翰林,在刑部主事约已二十年,容闳对他的评语是:“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品行端正,可惜胆小,缺乏责任心,不能做大事”。因为两人个性有些不同,后来在美发生齟齬,留学生事务所的关门与容、陈不和有直接关系,容后详述。

容闳负责筹划学生抵美后的寄宿事宜,所以先行抵达美国。因为容闳出身耶鲁,很自然的,他到达美国经纽约就直奔康州新港(New Haven)——耶鲁大学所在地。他首先拜访耶鲁大学校长泡特(Noah Porter)并遇到耶鲁大学海德利(james Hadley)教授,海氏劝他往谒康州教育厅厅长诺滋鲁布(B.G. Northrop),向他请教以哪种方式教导这批学生,因为这批学生对美国均一无所知,只会一点点英语,诺氏建议要使这批学生快点学会英文,最好让他们分散寄居在康州河谷地带(Connecticut Valley)的美人家庭里,每家二三人,但距离不要隔得太远,以利照顾,等学生英文程度达到能入学听讲时,再正式入公立学校,容闳非常赞成这个宝贵的建议,他决定在麻省春田镇(Spring field Massachusetts)设立留学生事务所总部。

容闳之所以把留学生事务所设在春田镇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春田镇位于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中部,且距离康州很近,距康州省会哈德福城不过二三十英里;二是容宏的好友麦克林夫妇(Alexander S. Mecclean)住在春田镇。当年容闳初到美国就读于孟松中学时,他最敬佩的一位教心理和生理课的老师布朗小姐(Miss Rebekah Brown)后与麦克林医生结婚,就住在春田镇,因此容闳认识了麦克林,麦氏夫妇待容闳极好,每当学校放假,必请容闳到他们家,容闳进入耶鲁后,得其帮助之处尤多,此次容闳奉命来此设立留学生事务所,就在麦氏邻近租房作为所址。但留学生事务所不久就迁往康州省哈德福城,这是采纳康州教育厅厅长的建议,同时哈德福又离耶鲁大学更近的缘故。

根据哈德福的户口调查记录,1873年留学生事务所的地址为Willard街43号。这一座建筑物是两幢相连,南边的一幢是一美国家庭住宅,西北边的一幢就是留学生事务所,前者尚有美国家庭居住,而后者因年久失修,破坏不堪,前后门均已封闭不能入内,仅可从后院进入地下室,六十年代这幢房子的主人为Jack Roseblit,他是当地房地产经纪人。

1874年,事务所又搬到附近的Summer街30号,这个时候清朝政府授权容闳在哈德福的colins街352号筹建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永久所址,耗资七万五千美元。修建此永久性所址原出于容闳之意。据容闳自传记述,建立永久所址,是希望此项留学计划能在美国根深柢固,不至于中途撤销,不料九年后清廷下令召回留学生,容闳的担心不幸竟成了事实。

1875年1月,他们正式迁入新址,留学生事务所系一三层楼房,可容工作人员及学生七十五人同时吃住。除了办公室及餐厅外,并有一大间教室,用以教授中文,据久居此间的张源先生说,六十年代初美国之音中国部记者曾专程来此访问留学生事务所。张先生曾陪同该记者进内参观,据说里面很宽敞,进内上楼处,有古香、古色的中国雕刻。当留学生于1881年夏奉召返国后,次年元月九日曾在哈德福报刊登出售广告,由Edward Kellogg出名。Edward Kellogg是容闳夫人的哥哥,曾任中国留学生事务所秘书。在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内,他恐是唯一的一位美国人。同时根据哈德福市政府的档案记载,留学生离美后,这座楼房的所有人(纳税人)也是Edward Kellogg,房子究竟何时卖出,无从查知。但在刊登出售广告后的第九天(1882年1月18日)哈德福报登有一段小新闻,记述前一天留学生事务所旧家具的拍卖情形。说吸引了许多购买者及好奇的人,共得款一千六百二十五元。

后根据哈德福报1885年9月21日记载,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改为学校,名称为Mr. Brown's School for

boys, 于次日开学,十年后(1896年底)由 Tierney 牧师购买,创办私立文科学校(Collins Street classical school)后改为 St. Francis 医院的护士学校,再改为护士宿舍,1967年因为 St. Francis 医院扩建,才予拆除,许多当年 St. Francis 医院的护士后来仍能道出该建筑物的里外状况。

第一批学生是 1872 年 8 月离开上海,9 月到达美国。由陈兰彬率领,两位中文教师,一位翻译及其他工作人员同行,次年(1873)第二批由黄平甫率领到美,第三批及第四批分别由祁兆熙及邝其照(翻译)带队先后抵美,其中,仅 1873 年有广东自费学生七人搭附前往。全部一百二十人,在留学事务所照顾安排下在美读书。

第一批学生到达哈德福城后,容闳按计划把他们分别住到不同的美国人家庭中去,这些家庭多半是地方官员,学校教师或医生,每家分住二人,有些家庭想接待照顾中国学生而不可得,虽然照顾中国学生由事务所支付费用,然而也可看出美国人对中国留学生的热情。第一批学生三十人,分驻在康州及麻省西部的十五个大小城镇或村庄,居住得比较分散。

幼童来美住定后,最重要的课题是补习英文。此项工作,除少数有正式老师外,多半由监护人或他们的子女们担任:一般来讲,这些幼童都相当聪敏,他们补习很短一段时间,即能进入当地公立小学正式随班上课。前面提到的容闳好友麦克林医师,他的续娶夫人,在未结婚以前即曾做过中国留学生的英文补习老师。当时她还是 Mathews 小姐,住麻省 Notrhampton(麦克林医师的第一位夫人原是容闳在麻省孟松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前已述及)。她是补习英文老师中比较杰出的,她为人热心诚恳,以家为校,花费了很多宝贵时间与心血,替中国学生补习英文,因为她的教法得当,补习很短时间,学生即能进入公立学校上课,在她手下教出来的有邝荣光、何建梁、张仁康、唐国安、邝景垣、苏锐钊,前三名系第一批赴美,后三名为第二批。在哈德福城有凯拉克(Kellogg)家里的两位女儿(大女儿玛丽,于 1875 年与容闳结婚,前已提及),巴特莱特牧师(Rer. Darid Bartlett)的三位女儿,哈城高中英文科教员 Katherine Burbank 太太, Helen Blackesley 太太,均做过中国留学生的英文补习老师。

这些学生有的只有十岁,只能进入当地小学读书,年龄较大的进入当地中学,俟毕业后,按他们的能力和志趣分别进入不同的学校,有的则进入正式大学,如耶鲁大学(詹天佑、梁敦彦、欧阳庚等),哈佛大学(如丁崇吉等),哥伦比亚(如唐绍仪等),麻省理工学院(方伯梁等),他们攻读不同科系,以期造就不同的科学人才,为将来中国建设而努力。

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成绩,比之美国孩子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有几位住在哈德福巴特莱特教授(David Bartlett)家里,如清末民初曾任外交总长及交通总长的梁敦彦及在矿业界颇负盛名的吴仰曾均在巴家住过很久,他们家里有三位女儿,当时也是十几岁的女孩,她们都是住在她家里的中国学生的玩伴,其中之一叫 Louise Bartoett 小姐的有这么一段追述:

“当时以我的玩伴来看他们,他们富有青春活力,非常聪明能干,一般来说,只要我教会他们一种游戏(Game),他们就会赢我,他们学英文非常快,初次见面时我们交谈有困难外,以后一点困难都没有了,等到他们进入学校,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们,他们读书进步很快,老师也为他们的成绩而骄傲。”

巴特莱特教授夫妇,于容闳初次到美读书时,就在纽约认识,巴家以后搬住哈德福,在日后的中国学生教育运动中占有重要角色,1910年,梁敦彦为感恩图报巴氏当时照应之恩,曾邀请巴氏姐妹前往北京居住游览一年。据巴氏姐妹以后谈起,他们在北京那一年,被梁氏待为贵宾,俨然有身为公主之感。

这批幼童生,当时在哈德福读书,给美国人留下了一个很好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待人接物,谦虚有礼,具有中国古有的道德风貌,翻阅当时当地报纸有关记载,都赞美这些中国孩子,可用下面这段追述作为代表:

“这些男孩都有君子之风,他们不但谦虚而且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崇敬他们,我们都以他们作为我们的榜样。这是他们国家的荣誉,他们对于美国人的友谊衷心感谢,对于美国家庭生活,他们很快地适应,他们还送给他们的监护人可爱的礼物,而且时时存有感恩图报之心。”

这一段是摘自 Clara Capron 小姐的一篇文章。提起 Capron 家庭,他们与中国留学生有一段关连,她的母亲是容闳在孟松学校求学时的同学。而且是容闳曾带去参加晚会的第一个美国女孩,在那个时代,这恐怕是学校大新闻,说也凑巧,1873—1874,中国留学生事务所设在哈城 Willard 街 43 号,那是一座两幢房子的建筑,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占北幢,而 Capron 家占用南幢。她那个时候比中国幼童生还年轻,她和事务所的人,上至监督下至洗衣工人都在后院隔着篱笆打招呼,或教他们英文,她有时也跑到隔壁去要中国糖果吃。

按留学生事务所的规定,他们必须穿着中国的服饰,或出国前做的制服,也必须蓄发辮,戴瓜皮帽,

着丝鞋,因此他们的同学都叫他们为中国女孩,因为在美国,只有女孩才穿着长服。这么大的孩子,在那个时代,穿长服在中国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就困难了,在教室里上课还可以,上体育场那就不行了,长袍马褂总不太适合玩棒球,所以他们慢慢地改穿长裤、短上装,和美国孩子一样,他们的发辫,常成了美国学生向他们取笑的材料,但是格于中国政府的规定,他们必须拖着这个“猪尾巴”,住在哈德福的 Fred Blakeslee,他的母亲前后曾负责过照顾七个中国学生,根据他的记忆:“当这些学生到达的时候,他们都穿着中国服装,然而很快地他们换穿美国衣服,因为割除发辫要受斩头之罪,他们必须保留“猪尾巴”,但是他们尽可能的不教别人注意,用衣服盖住,这些孩子对运动特别有兴趣,尤其喜欢棒球,他们利用我家对面的空地当棒球场。”割除发辫倒不至于受斩头之罪,但被迫回国,接受政府的惩罚倒是事实,如谭耀勋、容揆等就是因为割除发辫,按规定须遣送回国,接受政府制裁,最后两均不敢回国,但中途离开了事务所,所以留学生以后奉命中途弃学回国,而他们则都留在美国,并且都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幼童生平日除入当地公立学校外,还要上中文课,写中国字,还得兼习中学: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每逢节日,还要由监督召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又要望阙跪拜。当时事务所有此谕告:“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上紧学习,规矩不可变更。……至洋文汉文,更要融会贯通,方为有用。”所以每到星期六,公立学校放假时,他们必须要到留学生事务所上课,由两位中文教师负责,住得远一点的学生,亦分组调回事务所,接受中文教育,每组二十人,在事务所上课两周,他们也利用暑假学习中文,所以他们的学业远比美国孩子们重,但这并未影响他们的在校成绩,他们在学校中班级里大都名列前茅。

他们在事务所的中文课程,除读规定的书本外,还有作文、小楷等课业,在那种环境下,学生可能对于学习中文不会太感兴趣,所以作文、习字成绩优异者予以奖赏,“赏论八名:第一名银元三元、第二名二元、第三名一元、第四名八角、第五名七角、第六名六角、第七八两名各伍角;赏解二十名:第一名二元、第二名一元、第三名七角、第四名六角、第五名五角、第六至第十名各四角,第十一至二十名各二角五分”,“如不按照规定完成作业,亦有惩罚”,“以上作论解各名俱须照常习作,如有不行者,按月议罚,例在必行,并其所论解须用楷书誉正,寄局详阅,草率者不录,过十五日以后寄来者亦不录”。可见他们的课业还需要带回去做,做好再寄回事务所。由中文教师批正,每月一次,学生作业均用红笔批改。

他们不仅要读中国古书,灌输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同时在事务所里、专门一间屋子祠奉先圣孔夫子。住在事务所附近的留学生,每天先到事务所拜孔子,然后再去学校,这个做法,无非在使这批幼童学生,身在国外,仍能接受孔子思想的洗礼,不致因接受西洋教育而忘了本,这不但是中国政府的要求,也是留学生家长的希望。

当留学生刚住到美国人家里,尚未受到美国主人太大的影响时,均能严格遵守事务所的规定。举一个例子来说,根据一位留学生以后追述,他们到达美国后,第一个星期天,监护人带他们到星期日学校(Sunday School),当时他们的英文不好,没有听清楚,只听到 School,还以为是去正式学校,谁知刚踏进教室,他们发现不对,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回他们所住的地方。

他们离开中国时,知道不可去教堂信耶稣。但是时间久了,由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他们这么大的年龄,耳闻目睹、住美国的家庭,上美国的学校,天天和美国孩子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要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继续学习中文,严守中国旧礼教的规矩,实在已是件不容易的事,他们的思想观念在逐渐起变化,生活习惯上也在开始美国化,这种逐渐蜕变,在容闳眼里看得一清二楚,但他并没有严格执中国政府的规定。几年后,不但衣著美国化,而且有的学生干脆剪去发辫,改信基督,这种情况传到国内,结果是留学生事务所关门,学生被召返国了事。

留学生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除容闳外,他们的活动天地就是事务所,这当然是由于他们不会说英文,一切对外由容闳负责,因此他们对美国家庭生活全然不了解,对于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不知道,然而留学生所接触的全是美国环境——住美国家庭、进美国学校、读美国书和美国孩子玩。所以对于中国留学生西化不能体会认识而给予同情与理解,如陈兰彬就是初次赴美,在他看来,长袍马褂是中国传统衣饰,四书、五经是必修的课程,发辫是尽忠清廷的象征,可是在受过西洋教育的容闳看来,这并没有什么不当,何况他自己已是美国公民,而且是基督徒,所以容闳以监督身份并未积极反对留学生的西化,而且有时候陈兰彬与学生发生争辩时,容闳偶尔还要替学生说几句话,因此陈兰彬更受不了,于是两人之间也就日渐发生龃龉。

容、陈两监督既然意见相左,无法和睦相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陈自然会有孤单之感,所以 1874 年秋

(抵美后两年),陈兰彬请长假回国,并辞去监督之职。清廷派区岳良接替。陈兰彬回国不久,容闳和陈兰彬同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叶绪东为参赞。这个任命对容闳来讲是升官。但是容闳对新委任的这个驻美公使的官职并不感兴趣,他要求完成他的计划,奏请李鸿章准他仍留哈德福继续他的留学生事务所监督工作。后来清廷同意他的请求,任陈兰彬为驻美公使,改任容闳以副公使衔负责留学生事务所工作。

1876年,陈兰彬到华盛顿就任我国首任驻美公使,九月在白宫的 Blue Room,呈递到任国书。他这次到任带来人马不少,其中一名叫吴子登(按即吴嘉善,字子登),当留学生事务所区岳良监督辞职时,陈兰彬推荐吴子登代之,这个吴子登进入留学生事务所,和陈兰彬一样,吴对留学生的美国化表示不满,且向清廷不断打小报告,危言耸听地夸大幼童“西化”的危险,极力主张撤回留美幼童,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官员,尤其保守派,对于留学生的穿着,剪发及改信基督,非常不满,深信如此下去,他们将会全部美国化,不会返国为清廷贡献所学,全部计划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当时李鸿章仍支持容闳,所以他们也无可奈何。

至于在美国的容闳始终被蒙在鼓里,对吴子登的小报告,一无所悉,他还在函请美国国务院,准许中国留学生入美国陆海军校(如西点陆军学校及安那波利市海军学校)接受西洋军事教育,但是这个请求被美国政府拒绝,按 1867 年中美两国签订的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 Treaty)规定,中国学生有权进入美国军事学校求学,当李鸿章对于美国拒绝中国人入美国军校,显然有违条约,遂有意将学生送到英国、德国及法国,而这些国家欢迎中国学生前往读书。正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加州,怀俄明州等许多地方掀起排华运动,虐待中国移民,而美国政府对此并未采取行动。中国公使馆函请美国政府保护中国侨民,然而美国政府以“地方事件”为籍口,不予过问,且于 1880 年,国会更进一步通过排华议案,单方修正蒲安臣条约,删去许多条款,不准中国人移民美国,虽然有识之士如前葛兰特总统(Ulysses Grant),文学家马克·吐温、耶鲁大学校长泡特(Noah Porter)等提出抗议,但终为大势所趋,亦无可奈何。

由于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一位保守派官员上书清廷,要求解散留学生事务所,以报复美国,政府以此事征询总督李鸿章,公使陈兰彬及留学生事务所监督吴子登三人的意见,可以想见陈、吴得此机会,自然主张撤销留学生事务所,原本支持留学生事务所的李鸿章,因众议难反,开始转变态度,此时不愿为学生援手,即顺反对党之意而赞成其议。于 1881 年 3 月 31 日写了一封长信给总理衙门,陈述他对留学生事务所的存废意见,略谓:将此批留学生送到美国,受西方风俗习惯影响总属难以避免,他说他继续提醒容闳,不可疏忽对幼童的中文教学,然而他的警告并未生效,同时他亦说明结束留学生事务所会给美国人一个很坏的印象,特别是前美国总统葛兰特来中国时,曾要求准许留学生继续攻读。在那封信里,李鸿章亦指出留学生的花费浩大(每年约 10 万美元),大批金钱流国外,自然对政府不利。在那封信里,他并未作任何建议,他将最后决定权留给总理衙门,结果总理衙门于 1881 年 7 月 8 日正式下令结束留学生事务所。所有学生及工作人员束装返国。

当时在美国的容闳,为了挽救留学生事务所的命运,也曾费尽心力。协助容闳最力的是纯齐勒牧师(Rev. Dr. oseph. Twichell),他是哈城 Asylum Hill Congregational Church 的牧师,他不但是容闳的好友,而且是留学生的恩人,诚如留学生之一黄开甲于 1903 年赴美重访哈德福城答复当地报纸记者说:“纯齐勒牧师是中国留学生之父(Twichell Was the father of the boys)根据纯日记记载,容闳于 1880 年 10 月曾走访纯齐勒牧师,请他透过中国学生就读的学校当局,联名陈明此项计划目前在美进行良好,此时不应该结束留美事务所,此份请愿书由耶鲁大学校长泡特(Noah porter)起草,签名有学生的老师、校长、监护人及当地贤达名士如马克吐温,怀士林大学校长 Seelye、纯齐勒牧师等,请愿书不仅要求留学生事务所继续存在,而且颇含有抗议味道,今节译部分如下:

“……贵国派遣来美的幼童生,都能把握机会,努力读书,在校各种功课,均有进展,成绩优异。……在道德方面,大都优美高尚,态度谦虚有礼,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家庭、在学校以及在乡镇交了很多朋友……他们虽然年幼,然一举一动,都能以国家荣誉为重,所以能谨言慎行……现在这些学生如树木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且已将开花结果,今欲加以摧残,必将前功尽弃。

我们愿意提醒,这些学生原本由中国政府请求美国国务卿送入我们的家庭和學校,学习美国的语言文字,学术技艺以及善良的礼俗,以冀有益于中国,而今学生对科学文艺等,皆未完成教育,认为他们在此一无所得,将对贵国无何贡献,而贵国政府竟未加以调查,又无正式照会,突然下令从我们学校召回。……

如果我们疏忽或忘怀中国的语言文字,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基于这些考虑,特别是对于贵国学生

突受此重大损失,且我国无端受此教育不良的恶名,使我国的名誉受莫大的影响——我们深切希望贵国政府这一个突然决定重加考虑……我们建议贵政府在未解散留学生事务所以前,挑选诚实且有声望的人士来美,实地调查中国留学生在智育德育方面所受到的毁谤,因为这段毁谤使他们中途被召返国。”

这份请愿书由美国驻华公使转交清廷李鸿章,同时容闳请求纯齐勒牧师到纽约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将军,请他设法,纯齐勒在名闻世界的文学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帮助下,于1880年10月一个早晨,在纽约第五街旅馆里晋见格兰特将军(按:格兰特和马克吐温是要好朋友,马克吐温当时住在哈德福,其所住的房子迄今仍保存很好,供人参观)格兰特面允致函李鸿章陈述他的意见,希望留学生事务所得按原计划进行。这封信果然发生了作用。1881年3月10日容闳通知纯齐勒牧师他已收到北京政府的电文,留学生事务所目前仍继续下去,容闳兴奋异常,同时李鸿章告诉容闳,清廷预备要求美国出资及供给技术人员协助中国扩充及修筑铁路,可是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只是昙花一现,留学生事务所的命运并未挽救,同年七月清廷再度下令,要全部留学生及事务所工作人员限期回国。

1873年第二批赴美幼童中,有一个叫温秉忠的,后来成为宋霭龄、庆龄、美龄三姊妹的姨丈。温氏1923年12月23日,曾向北京税务专门学校D班同学演讲五十年前幼童留美的经过。讲词系英文,今据高宗鲁氏译文录如下:

……一位广东青年新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返抵上海,此位青年即容闳先生。……在他初入社会后,深感大学教育对他自己的裨益,而立一愿望,即游说中国政府派遣学生赴美接受西式教育。……他说,派官费学生出国,由于学生接受西方教育之知识及经验,增进与外国人民之接触,将有助中国在外交、商务及工业上之发展。

……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总管大权;但对首倡幼童出洋之事,犹豫不决,且存戒心,因为毕竟此一计划在保守的中国是太激进了。因此,他联络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丁日昌会奏朝廷,最后终于得到清廷之批准,容闳被任命为委员。……容闳原订计划是连续四年,每年派遣三十名幼童。1870年在上海设立预备学校,招收学生学习中、英文,每半年举行考试,合格者送往美国留学。……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准备。

……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Americanidea & Ideals),这些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幼童进入学校后,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很快,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适应了美国的环境。……

幼童在学校的功课是日益进步。当时有两位委员,其中一位是翰林(按即吴嘉善,字子登),深感幼童因环境蜕变之速,且正方兴未艾,他们将成“美化”(Americanized)之人,不复卑恭之大清顺民矣!他上奏朝廷,如不迅速行动,幼童均将成“洋鬼”(Foreign Devils)矣!皇帝照准请,立刻下令全体幼童即时撤局回华。

这个命令对容闳当然刺激很大,他的希望和努力全成了泡影。同时对这批留学生的前途影响尤大,当时已有六十多名学生已在大学或职业学校就读,但只有两人刚刚读完大学,这二人就是詹天佑和欧阳庚,均第一批抵美且毕业于耶鲁,第一批到达美国已有九年,离原规定的十五年尚差六年。第四批(最后一批)到美国才六年,大都还在中学读书。

清廷的命令他们只有遵守,根据当时报载,留学生事务所于7月9日关门,8月21日(亦即留学生束装返国的前夕),当地与留学生事务所有关的美国友人假巴特莱特(David Bartlett)家里举行惜别会,由纯齐勒牧师主持。

当时回国的学生约一百人,其他的有的是在美去世,有的因为违犯事务所规定,中途离开事务所,有的因经济关系或其他原因已提前回国。

去美去世的有潘铭钟,曹家爵等,潘是第一批,赴美时才十岁,曹系第三批,赴美时十二岁,违犯所规而中途离开事务所的有谭耀勋,他是第四批到美,因为改信基督及剪去发辫,被监督吴子登报告清廷,饬令回国,他不敢回国乃中途离开事务所,入了耶鲁大学。1883年毕业,不幸的是毕业后仅几个月因肝炎去世,葬于康州 Colbrook 的公墓。他的墓碑上刻有中文,记载着死者姓名及生死日期。另一位因犯所规而未敢回国者是容揆,字赞虞,第二批赴美,他是容闳的侄子,因为剪去发辫并改信基督,应该遣送回国,当留学生奉召返国时,他正在耶鲁读完一年,他因犯规,不敢回国,当留学生返国时,他藏在春田镇。他本在春田镇上中学,而且在春田中学已交上一位女友,名叫 Mary Burnham,这也可能与他不肯回国有关,至于是否藏在这位女友家里,则无可稽考。1884年毕业于耶鲁,名列第三,清廷宽恕他,任命他为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在大使馆工作了五十年,才退休,一直拖到1893年夏才和女友结婚,成了当地大新

闻,当地报纸详细报导了他们结婚情况,容家有孩子五个,他于1943年3月17日逝世于华盛顿。

提前返国的有邝景垣等数人,邝系第二批赴美学生,赴美时十三岁,在高中时,身体健康状况即不佳,提前于1880年回国,回国后不久在广州去世。至于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除了邝其照(曾率领第四批学生到美任留学生事务所翻译)外,均随队回国,留学生走后,他住哈德福,曾在Trumbull街W.H.Lockwood plant做石板印刷,他著有数种与英文有关的书,如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首页并有中文签名照片。康州Trinity College的图书馆内,还藏有他的著作。

留学生于八月底自哈德福去旧金山,在旧金山因候船,逗留数日,旋乘船过日本抵达上海,时为九月,阔别近十年的祖国,一旦重回祖国的怀抱多么令人欣喜,但是他们并未获得祖国的温暖,政府把他们视为“犯国法的一群人”,并未安排招待或作有计划的安置,踏上祖国土地,大都是各奔前程,自己谋生。

被撤回国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黄开甲的,回国后曾于1882年1月28日从上海写给他的美国教师一封信,信中叙述他们回国后所受的待遇是:“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书院。……跨进门槛,立刻霉气扑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各人被分派各地去“完成”(?)各自教育,但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全由中国官来决定”。黄开甲在信中说:“我们在期待容闲先生的到达。他是由政府虐待下解放救我们的希望。我们对他的信心一直不变。……”

这时的容闲,对于他的计划中途受挫,自然感到心灰意冷。他先是辞去驻美副公使职,然后率领学生一同回国,他本想回去后,设法把几位快要读完大学的留学生再送出来,以期能够大学毕业,但回国后,国内压力太大,视留学生为“罪人”,政府不予通融,在此情况下,想把快要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再送出来,已经绝无可能。两年后(1883)夫人在美有病。于是又怀着的一颗失望和沉重的心情,独自返回美国,与妻儿团聚,夫人病体虽一时稍有好转,但终于1886年5月29日去世,遗有两子,容闲从此在生活上既负父责又兼母职。

容闲这时已无能为力。经过这次教训,他才认识到:一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害怕人民的专制政府,本质上是不能实行真正的开放政策的。

《西学东渐记》第二十章一开始就写道:

学生既被召返回,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的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

这是一个极可宝贵的认识。为了建设现代国家,教育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而听任叶名琛之类的酷吏,吴子登之类的官僚来领导一切,那么,教育计划既不能认真施行,教育出来的人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于是容闲走上了和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一道谋求变法维新的道路。戊戌政变发生,他逃出北京,到上海继续活动,参加唐才常组织的张园“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结果因清政府指名通缉,逃往香港、台湾。在台湾,清政府又行文给日本总督,请日本当局把他捕送中国。于是1902年,他被迫再度去美国避难,一直到死。

容闲并不乐意做美国人,虽然他说“余曩曾入美籍”,但1898年美国国务卿雪曼公开宣布“容闲从未合法地归化为美国公民”。1902年容氏去美避难,还是通过美国的社会关系及耶鲁同学帮忙才得以实现。

1912年4月21日病逝于美国康州哈德福城,第二天,《哈城日报》刊登了如下一条消息:

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闲博士,昨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在他的沙京街284号寓所去世。……

他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的急剧进步变动密切注视,因为他毕生曾努力于此目的。星期日(4月20日)他刚收到新中国领袖孙逸仙博士赠送给他的一张照片,惜已太晚,因容闲博士早已昏迷不醒。

在他逝世时,他的儿子容颢槐正在中国接受孙中山和黄兴的委任,到胡汉民当都督的广东省担任制造局(兵工厂)总工程师兼总理,并被授予少将军衔,因此,后来被袁世凯逮捕监禁,险遭杀害。孙中山亲自寄赠照片给容闲,说明中国革命人民和这位居住在美国的同胞是息息相关的。

(责任编辑: 杨栩生)